

得书记

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

■韦力

此书为沈津先生所赠，从目录中可窥本书大概内容，其主体部分乃是谈论张元济、顾廷龙、瞿凤起、赵万里等目录版本前辈大家，当代收藏家则讲述了印谱收藏大家林章松先生。余外则是沈津先生为一些当代版本目录学家著作所写的序言，还有一组文章为目录版本学研讨会的发言，以及论述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30种日本所刊中国典籍的叙录。

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乃是第一篇《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阅读该文，让我了解到不少以往不曾知晓的细节。沈津先生首先称：“在中国书志学、版本学的各种图书中，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及《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两部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著作。”而本书专谈前者，“以此来纪念张先生诞辰150周年”。沈津先生此文乃是从商务印书馆创建讲起，而后提到张元济主持馆务达50余年的历史，以此来论述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筹建该所图书资料室的细节。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乃是国内实力最为雄厚的印刷企业，故张元济在董事会的支持下，大量收购名家旧藏，傅增湘在为张元济



《伏枥集》 沈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校史随笔》所写序言中称：

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浏览。耳闻目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筐藏，助成盛举。

正是这种百川归海之势，使得涵芬楼藏书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后来因为发生了暴动，张元济未雨筹谋，从涵芬楼所藏中选出500余种最

佳之本，合计5300余册，存放在租界地金城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内。几年之后的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飞机炸毁，后来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使得涵芬楼所藏中外典籍50余万册化为灰烬。这个结果当然令张元济痛心不已，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罪过，如果不将这些藏书收藏在一起，让它们仍然散存在各地的话，就不会出现同毁于此的结果。古人所言的“多藏必厚亡”，

于此得到应验。

好在几年前，涵芬楼藏书的精华已经储藏在了金城银行，但即使如此，张元济还是担心这些书日后的结果，因此他决定将此编一部目录，这就是《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缘起。而张元济是位认真的人，该书录编撰时间长达五年，此稿现藏上海图书馆，沈津先生对该稿进行了仔细翻阅，查证出哪些是张元济亲笔所批，哪些是他人校改的字迹。

沈津先生又提到该《书录》稿完成之后，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曾被利用过一次，那是因为顾廷龙和潘景郑编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而这段叙述也是我以往未曾留意者。沈先生还提到当年撰写《书录》初期，曾参阅过孙毓修所撰《涵芬楼秘笈》跋语，沈先生在文中将一些书录篇章与《涵芬楼秘笈》的孙氏跋语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异同。

对于书录的最终定稿，沈先生则提及1949年时，张元济已经83岁，体力明显衰惫，并且在该年底，张元济参加宁波同乡会的成立大会时，突发脑血管栓塞，于是书录最后乃是请顾廷龙予以完成。张先生在书录的序言中写道：

“稿成，储之篋中，未敢问世。信友李拔可敦促再四，前岁始付制版。工仅及半，余以病阻，事遂中辍。拔可复约顾子起潜赅续为之。”

沈津先生还查阅了《书录》出版前的校样本，他说该校样上还有胡文楷的校笔，而对于本《书录》的出版，沈先生在文中给出了这样的数字：

以上数字总计547部5000余册。据涵芬楼原藏善本的统计为3745种35083册，据此则烬余之数尚不足原藏之15%，其余85%有余均不幸在轰炸中灰飞烟灭。

该文还谈到了日本学者高桥智处存有一份顾先生据胡氏增补本的过录本。前几年，在几次会议上见到高桥智先生，每次都听他谈论其所藏的日本版《论语》的细节，却未曾听他谈到过还有这样一份过录本，这让我有了下次与高桥智聊天的话题。

沈先生此文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缘起和曲折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娓娓道来，读来即可窥得当年爱书人为了典籍的保存，是何等尽心尽力。此外，书中谈到不少以往我未知的掌故，颇有收获与意趣。

蔡登山的“大案牍术”

——《情义与隙末》和文史考据的写法

■文义经

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句话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的悲伤。历史研究要求谨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孔子治史谨慎，然而谨慎的代价是乏味，所以《春秋》写得犹如“断烂朝报”，也许可信，然不可爱。

若“审慎”过头了，历史便也无从写起。例如作者不得不面对的追问是：文献何来？材料的真实性谁能证明？谁又能为其证明而证明，如此循环往复，一切皆为可疑。再诛心论之，如果当时这份材料写下的只是违心的谎言，而机缘巧合之下，后世又只有这份材料留存于世，历史真相岂不是因这份材料而完全被遮蔽？这样思考，当然有些异想天开，但经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之后，两千年前的某些酷吏、儒生留下的“满纸荒唐言”，有时不就是我们面对的文献和历史材料么？这历史叙述如同黑泽明的《罗生门》。一个故事被许多不同的当事人作了许多有利于自身立场的叙述，读者无法认定哪个人的叙述是可信的。如果只有其中一人的供词留存了下来，那么历史记录和不可靠叙述的小说文本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历史研究的结果是经不起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质问的，因为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切结论，都有可能被推翻。然而，那份体现出考证过程的求真的

热忱和能力，而非具体成绩，或许才是我们唯一可倚待的历史可靠性所在。

蔡登山是史料的迷恋者，他的《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从生活细节，尤其是交往往来切入历史。这个切口，是作者颖悟历史人情的选择。庄子曾说，凡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所溢之美言、恶言，多为妄言，难以真正信任。而若之前交谊甚笃，其后割席断义，则往往有私交往来信件因意气而公布，结合事情颠末，往往能因此推出实情。百分之五的绝密文献，往往如卤水，点活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材料。所关注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力越大，则这些绝密文献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就越高。蔡登山就迷恋这样的文献，常常“惊呆”于背后的隐情。

这看上去很“野史”，但野史的“虚假性”定义往往只是“正史”遮蔽、扭曲、篡改的栽赃，如果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求真，那么先天认为“野史”为伪的观念，本身就不是历史研究的真精神。所以蔡登山在处理这些“野史”材料时，所用的方法，却是科学的手段。

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有材料出土，常会有新发现，有时虽是细微的事件，也会影响全局，甚至改变后人对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一般写历史的论著大都偏向于宏大的叙述，对于细节甚少去顾及，有些看似不重要的材料被忽略

了，但这些材料，有时影响甚大，若能细心爬梳，可能会把以往的整个论述推翻。因此蔡登山常常在这些细节上下功夫，在写文史方面的著作时，要求证据能呈现在那里，证物当庭，总不能随意去捕风捉影地推断或臆测。当然要找到这些证物绝非易事，蔡登山跑遍了大型的图书馆，查了拍卖图录，拜访了不少收藏家，才写出了20篇文字。

又如大数据推理。蔡登山被戏称为“文史界的福尔摩斯”，他是带着侦探的心情和方式，投入到历史叙事的事业上来。对他而言，历史的真实不在于自欺欺人的“客观”上，而在于历史人物忠实于其个人需求的表达上，而侦探就是要在这些忠实于自己的对外谎言中进行心理分析式的“云计算”。历史传主的自我陈述，勾勒了在自利的动机和时代浪潮影响下人的自我描述，在懂得用材料的历史学者看来，通过对人性的理解，这些看似主观的材料里就秘密传达了内心的真实情绪；而他人撰写的侧面材料则反应了他人在自利的动机和时代浪潮影响下对历史传主的审视，从而烛照出传主自处于时代的被看见的形象；书信则由于书写的私人性质，使历史书写具有直抉时代幕布下裹藏一角之人心的意味，为历史增添了情感和生命的细节。当材料碰触在一起时，这种书写的个性越鲜明，所呈现出的历史就越逼近于“主观的真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蔡登山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实”。这种逼近的真实，需要更艰难的推理，也需要更具耐心的理解者。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概念叫“大案牍术”，从大量的材料分析和计算中获取最具解释力的假设，再用此假设去经受所有材料的检验，从中推出最合理情的结论。这与福尔摩斯推理的思维方式相近，而文史考据者的工作，其实与侦探破案没什么不同。蔡登山致力于找到那些“无头案”或“案中案”的新物证，从而推演出这个案情可能性的某种走向以及更新的结论，给这个案件下一个往前再推进一步的判断，这个判断，可能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存在。

蔡登山一面讲说历史公案，一面也具象阐释晚清时代独特的社会生态，以及传主们的普通生活、荣辱心情。晚清故事的串讲，坊间自有多种著作，串讲必然显得大同小异，但蔡登山不作此等串讲，只力图说清案情始末，在他笔下，整个晚清呈现出的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虽没有一个是“真正”完整的，但就像一片片泛黄残碎的陶片，通过它的位置和留白去感受未能看见的沧桑，历史的真相于是亦不远矣。